

筑路报国：“儒工”赵祖康的烽火人生

赵祖康（1900—1995），上海松江人，曾担任国民党政府公路总管理处处长，作为当时主持公路建设的主要领导之一，在艰难情况下，与成千上万公路工人一起，在西北、西南地区兴建了多条战略公路，其中就包括著名的“三西”公路、滇缅公路。

襁褓开疆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公路建设的重心偏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因经济发展落后、地理环境复杂，公路建设进展缓慢。

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向国民党政府建言，须将兵力“深藏腹地”，拖住日寇打持久战。中国西北、西南地区的公路建设由此被提到国家战略层面。

也是这一年，结束在美留学实习的赵祖康被调入全国经济委员会，为公路建设谋篇布局。

1937 年 11 月 19 日深夜，赵祖康还在进一步谋划如何保障交通顺畅以适应战争军需供应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来者说，战事告急，南京恐要失守，请他即刻转移到大后方。赵祖康只能与家人连夜起锚溯江而去。

“这或许是父亲人生中最难熬的夜晚。”赵祖康的长子赵国通说。

赵祖康愤懑写下《出都吟》：“曾听慷慨追文史，却看仓皇作秀夫。”殊不知，这仅是他在抗战烽火中万里奔波的序章。长沙、武汉、重庆……他一面安置妻女，一面争分夺秒部署西南公路网。1938 年底，滇缅公路建成通车。

1940 年，日寇向宜昌逼近，矛头直

指重庆。彼时，主要铁路干线中断，重庆和外界的联系只能靠公路和水运解决。赵祖康收到命令：迅速抢通乐山至西昌的乐西公路，否则以军法论处。

“父亲一生与如此多道路打交道，若说其中最艰险、最沉重的，当数乐西公路。”赵国通说。

乐西公路海拔高差 2000 多米，蓑衣岭段常年被冰冷雨雾笼罩，盘山工程甚为浩大。建设者们不仅要克服设备原始、地形复杂等困难，还要应付当地土豪劣绅敲诈勒索。

险恶环境中，赵祖康与来自川康地区汉、彝、藏等民族的 20 余万名筑路民工，顶严寒，冒风雪，历时一年有余，抢通 525 公里的乐西公路，其间，4000 余名工人长眠于崇山峻岭间。

从此，这 525 公里成为连接滇缅公路、康印公路的战略公路。1942 年，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乐西公路转而支撑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陆空联运。

在乐西公路至险至艰处——蓑衣岭的危崖上，犹可见赵祖康当年所立“蓝缕开疆”石碑。他在《大渡河钢索悬桥落成记》里写道：“（乐西）路垂成，而员工之殉职者有之，病困者有之，父丧不得奔、妻子物故而不得归者亦有之。盖成路之难，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矣。”

更愿意被叫“儒工”

赵祖康被人称为“公路泰斗”“道路大王”，与詹天佑、茅以升并称“中国交通工程三杰”，但他并不同意诸如此类的名头。“父亲晚年的回忆文章中，

对自己的定义常常是‘一个工程师’或‘从事市政道路工程专业者’。”赵国通说。或许次女赵国明的评价更称赵祖康心意——一名“儒工”。

赵祖康生于 1900 年，他的成长伴随着近代中国动荡时期——列强侵略、辛亥革命、军阀混战。

1920 年炎夏，一份右上角印着大大“？”的杂志出现在上海街头。这份《问题周刊》是赵祖康与侯绍裘等同学在学校暑假期间创办。赵祖康作为撰稿“主力”之一，在一篇题为《为什么》的白话诗歌中写道：“为什么要磕头？为什么要叫‘老爷’？为什么‘割股疗亲’，叫爹娘吃人肉？……任他天般大芝麻般小的事情，都要问他个为什么。”

“那时的他青春浪漫，有激情、有憧憬，对社会有看法、有批判，然而他什么办法什么出路也找不到，所以这段“文艺青年”时光只持续了不长时间。”赵国明在一篇文章中如是形容父亲的青年岁月。显然，现实的困境和民族的苦难让赵祖康逐渐意识到，单靠文字难以改变现状。于是他将精力投入实学，以工程技术为毕生志业。

5 天 4 夜的“代理市长”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他主持《大上海都市计划》起草工作，还与茅以升等规划了越江隧道、跨江大桥等方案。然而随着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严重的通货膨胀令无数构想化为泡影。

1949 年初，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气息奄奄。赵祖康的内心是忐忑的。一方面，目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后，赵祖康同样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另一方面，他心里没

底——自己决不愿意跟国民党出走台湾，但毕竟长期在国民党行政部门工作，留下将会如何？

1949 年 1 月，赵祖康的同事王绳善私下告诉他，听到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欢迎上海市政当局的三名官员留下建设新中国，其中点名赵祖康。1 月 29 日，赵祖康在日记里记录：“夜听陕西电台广播。”可以想见，每当夜深时分，他便打开收音机，收听来自北方的清晰字句。

2 月 4 日，经好友介绍，赵祖康与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当时化名李敏）见面。“李敏曾多次对他说，形势紧急时，如有机会，可设法把市政府机关接过来，配合解放上海。”赵国通说。

5 月 24 日凌晨，赵祖康被急促的电话铃惊醒，被要求立即前往市政府商议要事。赵祖康赶到市政府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良对他说：“时局紧张，我们准备撤退了，托你担任‘代理市长’。”经过反复思想斗争，赵祖康接受了这一任命。受命后，他立即控制住警察局，维持社会治安。其间，上海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电力、自来水等供应持续如常，电车与船舶亦迅速恢复通行。

5 月 28 日，陈毅等人来到汉口路，正式接管上海市政府。赵国通仍保存着父亲当时的日记：“陈毅、曾山、潘汉年、韦惠到市府接收，陈毅（对我）表示好感，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

“我们一定很能合作的。”随后的几十年间，赵祖康先后担任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逢人常提起陈毅这句话。他说，陈毅的话一腔至诚，令他永生难忘。

据《中国新闻周刊》张杨彬/文

北宋“四相簪花”佳话

北宋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韩琦因与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推行“新政”被贬出京城，任扬州太守。新政失败，加上被贬，韩琦心里多少有点受挫。但好在扬州是个好地方，不仅富裕，而且很美。

扬州之美，自古便载于典籍——有“洛阳牡丹、广陵（扬州古称）芍药”之说，“扬州芍药为天下之冠”（出自《东坡志林》）的美誉更是流传已久。扬州芍药中，出名的很多，但有一种花形、花色尤为特别。它一枝四杈，每杈都开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红色，一圈金黄蕊围在中间。远远望去，就像身穿红色官袍、腰系金色腰带的宋朝官员，因此，当时的人们便称此种芍药为“金缠腰”，或“金带围”。

按宋代官制规定，只有宰相才有资格穿红色官袍、系金色腰带。因此，官员视此花为升迁吉兆，民间则流传着“金带围现，将出宰相”的预言。如此祥瑞奇花，而韩琦竟在自己的后花园中，与之不期而遇。韩琦掩饰不住喜悦。因为当时同在大理寺供职的王珪、王安石两个同事也正好在扬州，韩琦便立马命人去邀他们前来一同观赏。既然花开四朵，那就凑四个人吧！所以韩琦便又邀请州黔辖诸司使前来，但不巧的

是，此人正好身体不适，无法前来。于是韩琦就临时请路过扬州的同事陈升之参加。

传说当时在饮酒赏花之际，韩琦很是兴奋。酒过三巡，他半开玩笑道，听说簪了这种芍药，日后可以当宰相。说完，韩琦剪下这四朵金缠腰，依次簪在四人冠上。本是图个吉利，但谁也没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簪花的这四个人，竟真的都先后做了大宋宰相。

这段充满戏剧性的佳话，被做过扬州司理参军的沈括，完整地记载在他的《梦溪笔谈》中，题目为“四相簪花”。这种芍药从此被赋予神秘色彩，大家渐渐相信，这花是上天给读书人的暗号，是仕途坦途的预兆。

“四相簪花”不仅被文人见诸文字，更成为画家钟爱的题材。最著名的当数“扬州八怪”之一黄慎，他曾作过《韩魏公簪金带围图》。这幅画中的韩琦，手执一朵“金带围”，正簪于头上。人物造型生动，线条流畅洒脱。无独有偶，“扬州八怪”的后裔、清末民初画家李暨，也曾绘制过一幅《四相簪花图》扇面。正是有了这些画作，让千百年后的我们，得以遥想那场因奇花而起的佳话。

据《北京青年报》马庆民/文

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勤劳人 吉祥人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星 王乃良作